

李清照南渡事迹考辨*

马里扬

内容提要 “南渡”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一生经历中的转折性事件，但关于它的具体过程以及与之相关史实的考察，目前已有的描述与结论仍旧存在不够确切与不甚清晰之处。通过辨析《金石录后序》中的内在矛盾及其与赵明诚跋《赵氏神妙帖》之间的异同，参证相关史料，考证赵明诚跋文中的“西兵之变”与“江外之盗”所关涉的史实，进而回答并解决了造成李清照仓皇南渡的成因、出发地与起讫时间以及“归来堂”被毁经过等相关问题。

关键词 李清照 赵明诚 南渡 考辨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南渡的事迹，在她晚年所撰的《金石录后序》中虽有相关的记录，但其中既存有本人回忆时的有意无意的“失实”，也不免文献流传过程中因抄录、刊刻以及缺损而产生的讹误；至于南渡过程中的种种遭遇，在其本人又是“欲说还休”。而清代至民国研究李清照的学者也极少专门探讨所谓的“南渡”事迹。20世纪50年代后期，王仲闻先生从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中查找到了赵明诚跋蔡襄书《赵氏神妙帖》一文，为李清照南渡的历史还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黄盛璋先生依据此跋文，专门考察了李清照事迹中的“南渡”^①。但赵明诚跋文与《金石录后序》之间本有不易弥合的记述矛盾，而跋文本身所言及的史实又语意模糊、难以指实。因此，前辈学者所得出的结论仍旧是不够确切与不甚清晰的。此后，由于学者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在了通过揣摩李清照词的“深层寓意”为之“系年”上来，至于“南渡”这件李清照生平中的转折性事件的考察，反而有所忽略。有鉴于此，本文参证相关史料，拟就李清照南渡事迹详加考证，通过辨析《金石录后序》叙述矛盾及其与赵明诚跋文之间的异同，考证跋文所关涉的具体史实，进一步回答并解决造成李清照仓皇南渡的成因、出发地与起讫时间以及“归来堂”被毁经过等相关问题。

—

今所谓“通行本”《金石录后序》——清卢见曾校刊《雅雨堂丛书》本《金石录》所附——述“南渡”历程如下：

至靖康丙午岁，侯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篋，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既长物不能尽载，乃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又

* 本文系上海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规划项目、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4YS041）成果。本文渥蒙匿名评审专家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

① 王仲闻先生最初是在《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载《文史》第二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中刊布了这条“未经有人征引”的资料，但发现它并举示同好已在此前。故而，黄盛璋先生发表于《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的《李清照事迹考》中也并无“南渡”一节，后来附载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年版的《李清照集》“参考资料”中的《李清照事迹考辨》中专门增入，主要便是针对王仲闻先生所发现的赵明诚跋文所作的研究。

去画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无款识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画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屡减去，尚载书十五车。至东海，连舻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①

李清照南渡之前，时为淄州守的赵明诚已经“奔太夫人丧南来”。王仲闻先生据“明会稽钮氏世学楼抄《说郛》本《瑞桂堂暇录》”即所谓“钮抄”本对勘，云：

“奔太夫人丧南来”，钮抄此下有空格若干。按《后序》此处文气不接，意义不明，必有阙文。钮抄尚留空格，足资考证，最为善本。^②

据此处“阙文”可得推论者二：一为弃去笨重书册器物而载十五车书南下的主语应为李清照而非赵明诚，此王仲闻先生辨之已明，不备引^③；二为赵明诚母郭氏太夫人歿于金陵，而非青州，此一点极为值得注意；诚如黄盛璋先生所推测，郭氏太夫人应该是随着长子即赵明诚的长兄赵存诚官于金陵^④。依照常理，赵氏既家青州，赵明诚应在南下奔丧后，护灵柩返回“故第”，但从赵明诚的行踪来看，并不见北返回籍的迹象。

赵明诚南下奔丧的建炎元年（1127）三月前后，整个时局正在发生着一次大变动，自上年即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就围逼汴京的金兵开始押送徽、钦二帝分两批向北撤退。但在金人围逼京城的同时，曾“纵兵四掠，东及沂、密”，“杀人如刈麻，臭闻数百里，淮、泗之间，亦荡然矣”^⑤。赵明诚南下因官员的身份，自是“乘传”亦即通过国家提供的驿站前往。而沂州、密州是与青州、淄州相接，“淮、泗之间”为赵明诚南下必经的地域。至于赵明诚所到达的江宁府，则正在建炎元年（1127）四月初一日，发生了兵乱——知府被囚，通判等主要官员十一人遇害，“官属之不死者皆遁”，“公私为之一空”。直至五月己亥（本月庚寅朔，己亥为十日）才在赴“行在”（即南京应天府）途中的李纲部署下，以招安为名，平息了变乱^⑥。计算时日，若郭氏太夫人三月间亡故，旋即便遭遇江宁兵乱。以赵明诚三月启程计，他到达江宁府的时间应该在四、五月间，此时仍在乱中。赵氏兄弟不曾扶柩北上，或者正为江宁府兵乱所沮以及有意躲避北方的金兵与盗贼之故。

南来未久，赵明诚即“起复”知江宁府。《金石录后序》记此事在“建炎戊申（1128）秋九月”，而《系年要录》则记载为元年丁未（1127）秋七月丁巳日“起复”——时赵明诚守制未满，应是靖康国难后，因急需任用官吏，“不拘常制”如此——至秋八月到任。后者可从^⑦，盖将甲子“误记”，即“丁未”记为“戊申”，此在古人追记时为常有之事；至于“七月”误为“九月”，其

① 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卷三《金石录后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311页。按：该本与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皆以《雅雨堂丛书》本作底本。

②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卷三《金石录后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79页。

③ 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见《李清照集校注·附录》，第237页。

④ 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见《李清照集·参考资料》，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42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6页。按：以下征引该书，简称“《系年要录》”。

⑥ 《系年要录》卷四、卷五，第78、106页。

⑦ 《系年要录》卷七，第154—155页。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据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一四系赵明诚“起复”在八月，且衔名为“朝散大夫、秘阁修撰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南东路经制使”，此与《系年要录》所载“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微异。按：《系年要录》云七月起复，八月到任，则《景定建康志》云“八月”者，是赵明诚到任之时。而靖康国难之后，凡起复为帅府，多带“直龙图阁”。《景定建康志》所录“秘阁修撰”、“江东经制使”，当为赵明诚守江宁府后的转官升迁，即由刚赴任之时的“直龙图阁”转一官为“秘阁修撰”，《系年要录》卷二〇“三年二月甲寅”已称“秘阁修撰赵明诚”。究竟为“经制副使”抑或“经制使”，还是初命时为“经制副使”而后迁为“经制使”，则不能确知。

责任或并不在李清照，为文献流传过程中的抄录刊刻所致^①。所以知者，是与李清照南渡的起始时间密切相关。

二

“奔丧”与“起复”是赵明诚不能北返青州的客观原因，但这显然并非构成李清照仓皇南渡的必要条件。换言之，如果赵明诚在江宁守丧并“起复”帅府，那么南渡的李清照何苦抛弃收藏器物、作仓皇逃亡之状？由于《金石录后序》语焉不详，且仅有的“十二月金人陷青州”也存在着“失实”^②。因此，欲于李清照南渡时间与动因的问题有所解答，只能依赖赵明诚跋《赵氏神妙帖》文中的记载；其文云：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③

这里所提及的“西兵之变”与“江外之盗”两事，虽是有史可查的，但究竟应指何时何地之事，则前辈学者所指认出的历史事件，似都不够吻合。

黄盛璋先生认为“去年秋西兵之变”的史实是指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青州兵变事。事略为“临朐士兵赵晟聚众为乱”，青州守曾孝序派将官王定率兵捕之，结果大败；但孝序不准王定回城，严令立功赎罪，最终导致十二月壬辰日王定率败兵入城，杀孝序。此事被指认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它发生在青州，并与《金石录后序》“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的“十二月”相合。但赵明诚跋文明确说是“去年秋”，黄盛璋先生便为之弥缝说“赵晟起事时间较早，可能在秋季，至曾孝序被杀在十二月”；并据此推断“清照南来，大概就在此时”^④。王仲闻先生在《李清照事迹编年》中同样征引了青州兵乱一事，但他的用意主要是纠正《后序》中的“十二月金人陷青州”的“失实”。在与赵明诚的跋文参证中，对于时间上出现的不吻合，说：“如非笔误，则当为另一次兵变。”或许因为这一怀疑的存在，故将李清照“南渡”的时间定在了“十二月”之前、“明诚知江宁府”之后。但王仲闻先生既认为李清照是在建炎二年（1128）春到达江宁^⑤，则南渡的时间起点应该不会与黄盛璋先生所谓的“十二月”有过大出入。

赵明诚跋文明确说是“西兵之变”，这里的“西兵”显然是不能含混理解的用辞。《系年要录》卷一“元年春正月庚子”载：

自金再围城，四方师帅望风不进。时敌以兵五万守潼关，扼西兵来路。^⑥

所谓“西兵”，即从地理方位讲是来自潼关以西的士兵。推寻源头，应是相对北宋所谓“东兵”而言。赵匡胤、赵光义兄弟自中原汴宋之地起家，最后剪灭北汉政权，开始屯兵西北，直接面对契丹以及后

① 按：“七”、“九”形近易讹，文献流传中不乏其例，如《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上趣骆谷”下《考异》云：“《续宝运录》：‘戊子，帝至骆谷婿水驿，乃下诏与牛颢、杨师立、陈敬瑄，云今月七日，已次骆谷婿水驿。’按此月庚辰朔，戊子九日，而诏云七日，‘九’误为‘七’也。”（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7册，第8240页）

② 按：“金人陷青州”事发生在建炎二年（1128）春正月癸亥日，而金兵“焚掠”青州“殆尽”，已是建炎三年（1129）春正月丁亥日（《系年要录》卷一二、卷一九，第214、294页）。因此，王仲闻先生等认为，《金石录后序》中所谓的“（建炎丁未即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失实”。关于这一问题的辨正，详见下文。

③ 引自王仲闻《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载《文史》第二辑，第181页。又，见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宋名人真迹·蔡忠惠赵氏神妙帖》，《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1页。

④ 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见《李清照集·参考资料》，第187页。

⑤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附录》，第237页。

⑥ 《系年要录》卷一，第32页。

来西夏的军事威胁。赵宋军队的主力起初是来自京师的“禁军”，由于自东部诸郡而来，故谓之“东兵”。随着时间推移，驻扎在西北的“东兵”战斗力下降，甚至不能适应西北边境的自然环境。故夏竦就曾建议“增置土兵，易戍东兵”^①。所谓“土兵”，本是相对于“禁军”而言的“乡兵”，也就是非正规的士兵；但他们出身西北当地，战斗力较强，成为所谓“西兵”的主要组成部分。经过仁宗朝四十二年太平之后，西北战事日增，出身当地的士兵数量随之扩大，后来便将潼关以西、驻扎在“陕西路”（包括今天河南省西部、陕西省、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甘肃省东南部）的士兵统称为“西兵”。徽宗末年，在童贯等人的主导下，宋朝高层开始谋划联合女真夹攻契丹、夺回燕云州郡的计划，“河北军与陕西、河东更戍”，“西兵宿将”也领命“会京师”^②。后来，因为金人灭辽后，迅疾南下，戍卫河北的“西兵”则交战不利，部分溃散作乱^③。赵明诚跋文所提及的“西兵之变”，即指此类从西北边郡“更戍”而东来的士兵，他们被金兵打散，游走山东诸郡，发生叛乱的事件。检核建炎元年（1127）秋山东群盗之活动，所谓“西兵之变”，当指秋八月末李汲等之乱，史载：

博州卒官仪聚众数万人，迤邐寇莱州，至是，据即墨县。时又有溃卒李汲、刘三将合数千骑犯莱州。仪利其马，给之神霄官与之会，伏兵击杀之，尽并其众，军势甚盛。^④

官仪为建炎初年山东剧盗，自兼并李汲、刘三将的骑兵后，连下郡县，官府不能制。赵明诚所说的“西兵之变”中的“西兵”，准确所指应为李汲等。史称他们为“溃卒”，自是“溃而为盗”^⑤者，故为东来之“西兵”无疑。

细绎靖康间史实，李汲等这一支扰乱山东的溃散西兵，大可怀疑是来源于当日著名的“胜捷军”。至于建炎二年（1128）远在江宁府的赵明诚之所以能够准确命名这支溃兵为“西兵”，也是源于他在靖康元年（1126）淄州守的任上，曾参加过平乱“胜捷军”溃散部队的战斗。据《宋史·童贯传》载：

贯在西边，募长大少年号“胜捷军”几万人以为亲军，环列第舍。^⑥

同书《韩世忠传》载：

时胜捷军张师正败，宣抚副使李弥大斩之。大校李复鼓众以乱，淄、青之附者合数万人，山东复扰。^⑦

许景衡《赵明诚转一官制》云：

敕，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剪除残孽，拊循兵民，以纾朝廷东顾之忧。惟尔之职，往其懋哉。可。^⑧

赵明诚于靖康元年（1126）守淄州期间，曾因斩获“逋卒”转官，实为他一生中收辑金石文物之外的重要经历，但自来不能得其详。按：此事既然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便并非绝然孤立。童贯经营“西边”所创立的所谓“胜捷军”，在他于宣和七年（1125）的冬天见金人南下之势难以阻遏而逃回京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册，第2958页。

② 《系年要录》卷一，第18页。

③ 按：《系年要录》卷三“元年三月甲寅”载：“西兵安义溃散无所归，与其徒去为盗，掠汝、颍间。”此即“西兵之变”之一例。

④ 《系年要录》卷八“元年八月”，第166页。按：《系年要录》附官仪事在本卷末，仅云“是月”，不明具体时日。《宋史》卷二四《高宗纪》载：“丁亥，博州卒官仪作乱，犯莱州。”（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册，第448页）建炎元年八月戊午朔，丁亥则为三十日，定在月末无疑。

⑤ 《系年要录》卷七“元年七月庚寅”，第140页。

⑥ 《宋史》卷四六八，第39册，第13661页。

⑦ 《宋史》卷三六四，第32册，第11357页。

⑧ 引自王仲闻《李清照事迹编年》“靖康元年丙午”，见《李清照集校注·附录》，第236页。又，见许景衡《横塘集》卷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27册，第230页上。

城后,也随之东来,即所谓“西兵”。“胜捷军”在宋钦宗即位改元的靖康元年,部分驻扎河北,即张师正所率部。“胜捷军”在遭遇南侵的金兵后惨败,张师正本人受到军法处置。而素来作威作福的“胜捷军”则不能接受这一处罚结果,在大校李复的鼓动下发生了变乱,其区域在淄州与青州之间。当是时,赵明诚正在淄州守的任上。以上时地人事综合参证,则《赵明诚转一官制》中所谓的“逋卒”为乱,已经震动京师,必是与这次“胜捷军”溃兵作乱相关。据韩世忠本传,“胜捷军”乱兵后来虽为韩世忠所剪灭,但所谓起初的“淄、青之附者合数万人”,应是形成了一人振臂、万人影从之势。由此可以作一推定的是,赵明诚在淄州所斩获的“逋卒”,即便非“胜捷军”本部,也是依附“胜捷军”溃兵的地方士卒;而在韩世忠剪灭“胜捷军”溃兵之后,其影从附和者仍旧为山东地区的隐患。

正由于建炎元年(1127)七、八月间李汲等溃兵为变,是与前一年为乱的“胜捷军”溃兵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因此,远在江宁的赵明诚能够知其来源而称其为“西兵之变”。

三

赵明诚跋文称李清照南下逃亡的时间在“去年秋”,当是在他建炎元年(1127)七月“起复”知江宁府之后约八月间寄书至淄州,要求李清照动身南下的;也正在此时,淄州地区遭受到李汲、官仪等侵扰,甚至出现了城破。史载官仪一伙是起自博州(今山东省聊城市),“迤邐”而来寇莱州,博州在西,莱州在东,“迤邐”经过者,为齐、淄、青、潍四州。此时,继任赵明诚的淄州守恐在抵抗乱兵盗贼的战斗中殉职。所以知者,是赵明诚守丧解职,他的继任者或是由上一级的“监司”官兼任,或为知州副贰官的“通判”代理;但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抵抗金兵的“权淄州事”的却为“迪功郎李某”^①。以迪功郎仅为“从九品”的官阶来看,本应任县尉一职。那么“李某”的暂时代理,当是因为赵明诚的继任者殁于“王事”,也就是在抵抗盗寇侵犯时殉职。以时间来看,淄州在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金兵来犯之前所受到的盗寇侵扰,便是建炎元年(1127)七、八月间辗转掳掠山东北部地区的李汲、官仪等乱兵与盗贼。也正因此,迫使李清照不得不舍去笨重书册文物而仓皇南下逃亡。

由此,李清照南渡的出发地也就并非一贯认为的青州,而是应在淄州。这里更有一个“内证”,即辨明出发地的问题,可以解决《金石录后序》自身存在的叙述矛盾——李清照既然已经明确说预备明年春天“再具舟载之”,也便根本是谈不上“去”笨重之书册器物的问题,它们是大可以锁存入“青州故第”包括“归来堂”在内的“十余屋”中的^②。如果我们判定南渡之际的李清照并不是在“青州故第”居住,而是身在赵明诚曾作守的淄州,那么这一矛盾也就自然化解了。反观当时的青州,是“京东东路”帅府所在,军事防御能力较临近州郡为强,纵在八月间也遭到了李汲、官仪等来犯,尚不致城陷,“青州故第”的“归来堂”也可以无虞,此亦李清照规划来年春再度运载之故。

但这批存放在“青州故第”的“书册什物”也只是保存到了本年的十二月。由于青州发生兵乱,帅府曾孝序被杀,“京东无帅,士大夫亦皆避地”^③;紧接着建炎二年(1128)的正月青州又遭金兵攻陷,仅存的一丝希望也便在这连锁性事件中完全破灭。留守在“青州故第”的赵李族人、家奴也应在此时“避地”南来,时间即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至次年正月间。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在江宁得知包括“归来堂”在内的“青州故第”十余间被焚毁的消息,至早也在建炎二年(1128)春三月间。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将此连锁性事件联属,仅写出“十二月金人陷青州”作为青州“归来堂”书

① 《系年要录》卷一八,第288页。

② 黄墨谷先生《宋李清照易安居士年谱》认为“归来堂”书库与“青州故第”十余屋“恐系一地一事”;见黄墨谷《重辑李清照集》卷七,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55页。按:此说可从。

③ 《系年要录》卷一二,第214页。

库被毁的原因——这种与史书龃龉的“失实”记载，也应是在情理之中。

至于赵明诚于“建炎二年三月十日”所作跋文中，言及“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则是由于尚未得到“青州故第”被焚毁的消息，故他所谓“家”，或也就并非指“青州故第”，应是在淄州的寓居。跋文又谓“老妻独携此而逃”，即李清照于秋八月间舍去笨重书册器物，携十五车书南下之事。只是这个“独”字，很让人疑心是李清照仅仅携带了这幅书帖而逃。但赵明诚本人又说经过镇江时遇盗，“此帖独存”；一前一后两个“独”字，矛盾显然，无非是赵明诚凸显自己备感珍视而已。况且这种语气，也恰恰符合赵明诚收藏书籍文物的心理。如《金石录后序》所载，在李清照看来本为“适意”遣兴的“收书”之举，却在赵明诚那里愈加谨慎起来，所谓“欲求适意反取悛栗”的状况，曾经也是令李清照颇感“不耐”的。

四

赵明诚跋文中随后提及的“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前辈学者一般认为是指建炎二年（1128）春正月张遇陷镇江事。上文既已说明建炎元年十二月青州兵乱之事不够吻合，则此紧接而来的张遇事，亦非与之相切合的史实。

这里首先需讨论的是，何谓“江外之盗”？《通鉴》胡三省注云：“中原以江南为江外。”^①张遇“本真定府马军，聚众为盗，号‘一窝蜂’。自淮西渡江，水陆并进”；自建炎元年（1127）冬十月至二年（1128）春正月，扰乱沿江诸郡，先自池州，循江而上，至江州、黄州；又自黄州东下，陷镇江^②。既然张遇一伙本是自“淮西”渡江而来扰乱大江南北两岸（池州、江州在江南，黄州在江北），依照时人称呼“盗贼”的惯例，可以就其起事之地所在的“淮西”而称他为“淮西之盗”。于此，可以参证时人对宋江与方腊的称呼。《宋史·张叔夜传》称“宋江起河朔”，汪应辰（生活年代与赵明诚为同时稍晚）《文定集》卷二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谓“河北剧贼宋江”。宋人书中又称“山东盗宋江”（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京东贼宋江”（方勺《泊宅编》卷下），则今山东地区、宋之京东路为宋江横行之所，甚至可能有结寨之地，即后世所谓梁山泊者，故也有此种称谓。但据李若水（与赵明诚为同时人）《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诗说“去年宋江起山东”，则宋人称其“山东盗”与“京东贼”，也是就宋江的起事之地而言的——无非当时有起于河北与起于山东的不同说法而已。至若《东都事略·徽宗纪》与《宋史·徽宗纪》称“淮南盗宋江”，则谬误显然，不足据。又如方腊于“睦州青溪县”起事（方勺《泊宅编》卷下），《宋史·侯蒙传》即称其“青溪盗”、而《系年要录》则谓“睦贼方腊”^③。至于张遇，《宋史·王德传》也正是称“池阳寇”^④，亦即依据他起事之地的池州。且当张遇自池州起事之时，赵明诚正在与之临近的江宁府，不会不明了这伙盗贼的来源。因此，如果是指张遇陷镇江一事，赵明诚应该称他是“淮西之盗”，而决非“江外之盗”。

检寻建炎元年（1127）之史实，本年秋九月，有一伙发生在“江外”的盗寇，扰乱了江南大半地区的安宁，且对镇江一地有过血腥的掠夺。这次“江外之盗”的出现，是需要稍向前追溯到八月初发生的“杭州军乱”。军乱发生后，守镇江府的宗室赵子崧上书告变，正在准备以“巡幸”南方的名义

① 《资治通鉴》卷一七六，第12册，第5496页。

② 《系年要录》卷一〇、卷一一、卷一二，第189、198、212页。

③ 按：以上关于宋江、方腊的史料，见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46—351页。又，“李若水”一条，见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辑（总第十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268页。另，“方腊”一条，见《系年要录》卷一，第18页。

④ 《宋史》卷三六八，第33册，第11447页。

躲避金兵的高宗赵构即“命御营统制辛道宗将西兵二千讨之”。九月，辛道宗所率领的“西兵”到达嘉兴县，由于辛本人的贪污，导致以高胜为首的士兵哗变，而高胜原本就是“太行山之盗”。这伙变乱的士兵，在高胜的率领下，不再向杭州方向进发，而是掉转回头，进攻秀州、平江府。其徒赵万为首的一伙至无锡县，罢相未久的李纲寓居于此，“出家财散之，贼乃去”。赵万等在九月乙卯（本月戊子朔，乙卯为二十八日）入镇江府境，赵子崧兵败，“率亲兵保焦山寺。贼逾城而入，纵火杀人，莫知其数万，遂据镇江”^①。这伙叛兵最终被张俊、刘光世等领兵镇压；《宋史·张遇传》载：“时江淮群盗蜂起，俊讨杜用于淮宁，赵万、郭青于镇江。”而同书《刘光世传》则云“平镇江叛兵”、《王渊传》称“平军贼赵万于镇江”^②；是可知赵万一伙，既是乱兵又是盗贼，故赵明诚称他为“江外之盗”，也是准确的。只是，张俊等平乱之后，随之而来官军的劣迹，同样给镇江民众造成危害。《系年要录》卷一二“二年春正月辛卯”载：

户部侍郎兼知扬州吕颐浩转对，论官军所至，争取金帛之罪犹小，劫掠妇女之祸至深。愿申谕将帅，自今有犯，必罚无赦。昨镇江城中妇女有尚在军中者，亦乞速令放归。诏以付诸将。^③此所指抢掠镇江妇女的恶性事件，定为此次剪灭高胜、赵万等“江外之盗”的官军所为，时间当是在建炎元年的十月初。赵明诚跋文既云“老妻”携《赵氏神妙帖》南逃，“未几”，又在镇江遇到了这伙乱兵盗贼。那么，李清照到达镇江的时间也应该是“贼入镇江府境”的九月末十月初。

综合以上所考，可以就李清照南渡事迹考证得出结论如下：

（一）南渡的出发地或不是青州，应是在赵明诚曾作守的淄州；

（二）李清照弃去书册器物而仓皇南渡，是源于建炎元年（1127）秋八月间的“西兵之变”——这是靖康元年抵抗过金兵且来自西北的“胜捷军”的溃散余部，此际又与山东地方群盗融合所发生的变乱。此时，“青州故第”尚存，故有来年春运载南下的计划；

（三）因遭遇了九月发生在镇江的“江外之盗”——这本是前往杭州平乱的“西兵”，但因其中来自太行山的盗贼煽动，遂演变成危害江州郡的剧盗，李清照到达江宁府的时间可以断定是在建炎元年（1127）冬十月上旬。数月之后，“青州故第”所存“书册什物”也在十二月至次年正月间因青州兵乱以及金兵来犯而遭到焚毁，使得来年运载的计划完全破灭。

又，李清照晚年为文，每自署“易安室”，前人于此多有争论；实则，“易安室”当是“青州故第”之“归来堂”中的一间^④。南渡之际，身在淄州李清照能够自携十五车逃亡，但于其最为牵挂的青州“归来堂”以及其中的“易安室”，则因事出突然，加之后来时地的限制，终不及南迁而留下遗憾。

〔作者简介〕 马 里 扬，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发表过论文《“眉山记忆”与苏轼词风的嬗变轨迹》等。

（责任编辑 刘京臣）

① 《系年要录》卷八、卷九，第160、170、177、180页。

② 《宋史》卷三六九，第33册，第11470、11479、11486页。

③ 《系年要录》卷一二，第208页。

④ 按：夏承焘先生认为“易安室”是李清照自谓赵明诚的“妻室”。由于自古并无此种自我称谓，因此这一观点遭到了质疑，王仲闻先生云只是“一般房屋之室”（见《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载《文史》第二辑，第174页）。从命名上来看，“易安室”与“归来堂”有着明确的从属关系——“室署易安，堂名归来，皆本陶渊明‘归去来兮，……审容膝之易安’。”（徐培均《李清照集笺注》卷三《金石录后序》，第325页）由此可以推定，“易安室”应为“青州故第”之“归来堂”中的一间。